

甘粕正彦与满映

李 民

—

甘粕正彦是个以残暴与诡诈而臭名远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。青年时代在东京任宪兵大尉，乘1923年东京大地震慌乱之机，曾超越法律，私自将所捕的虚无主义政党党魁大杉荣处死，甚至把大杉荣的小孩也用棉被包住投入井内，极其残酷。为此，被法院以私刑罪判处徒刑。但日本军方却认为甘粕正彦的行为是出自忠君爱国的赤诚，暗中营救，把他送往法国学习美术，以掩人耳目。不久，即由军方参谋部派遣，潜入中国搞特务活动。引诱溥仪来东北唱傀儡戏，就是甘粕所参与的阴谋之一。

但是，由于甘粕正彦在名义上是个经东京法院判处徒刑的罪犯，因而尽管他忠心耿耿，手段高强，搞阴谋诡计的功劳也不小，却不能回国，更不能担任公职，只能作为一个高级浪人，在国外暗中活动。而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铺开之后，关东军方面一则觉得甘粕的历史作用已经过时，而且名声太臭，已无利用价值；二则甘粕自己组织所谓“海南岛会”，主张把侵华矛头的重点放在海南，与关东军主流派的步调不一致，又兼刚愎自用，桀骜不驯。所以就不再让他插手军事政治问题，只给予优厚待遇，为他在大连安排别墅、游艇，让他过优裕生活。于是，饮酒（饮高级英国名酒“威士忌”之类）、钓鱼，便成为他悠游岁月的两大乐趣。见过他的人会注意到，他的右手背有一部分

被阳光晒黑，就是长久执杆垂钓所造成的。甘柏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，他没有娶妻生子，始终过独身生活。

可是，作为一个多年上窜下跳的浪人，甘柏当然不甘于闲居的寂寞。这时恰巧关东军对满洲映画（电影）协会的政客管理，感到不满，想要改革。于是便看中了这个不甘寂寞而气性凶悍的甘柏，把他安放在大权独揽的理事长的职位上。从此，甘柏就离开大连的别墅，来到长春，寄宿在车站前的大和旅馆（今春谊宾馆）。每天乘专用汽车（司机为中国人张某）到红旗街（今红旗街）南边的满映去上班。时当1941年春^①，二次大战爆发以后。

二

满映作为贯彻日本文化侵略政策的所谓“国策会社”，行政业务上受伪国务院弘报处的监督，实质上则为关东军报道部所控制。据笔者回忆，当时关东军对满映以根岸理事为首的、主要是来自日本松竹电影公司的领导人员和专业骨干深感不满，认为担任总务部长的山梨，独断专行而又无能，行政管理非常混乱，担任制片部长的牧野年纪太轻，华而不实，只靠影界巨头牧野家族的门荫而出人头地，并无真才实学（弘报处武藤处长也持此看法），他所指挥拍摄的影片，与上海拍制的中国影片相比，在市场上几乎毫无竞争能力。这样的制片厂对贯彻关东军的“国策”十分不利。因此，决定加以整顿和改革，这一任务就落在甘柏正彦的头上了。

甘柏上任伊始，立即以法西斯军人的威风，向根岸、山梨和牧野等当权派展开了进攻。

^① 满映成立于1937年8月21日，甘柏是1939年11月1日就任满映理事长。

第一把火是突然以理事长身分召开全厂职员大会，首先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就以严厉的口气痛斥原有管理人员的腐败与无能，鼓动大家当场揭露。记得他曾目空一切地大喊：“摧毁个把满映，算得了什么！”又说：“别管他什么理事、部长，有问题你们就敞开说！”全场几百人为之震惊。尤其是日本人都知道甘粕是个心狠手黑的军人，在他的威吓下，全场都噤若寒蝉。以根岸为首的一派当权人物，更表现出一副狼狈相，场面十分尴尬。既没有人提出异议，也没有人揭发问题，只是经过一段死一样的沉寂之后，由甘粕宣布散会了事。

第二把火是突然公开宣布将掌握行政实权（掌管庶务、会计、宣传、设备、基建、人事等）的总务部长山梨免职，调往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工作。这一下子，给了盘踞各个岗位上的根岸一派日本职员极其巨大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甘粕调换了人事课长（相当于处长），抓过来人事大权。新任的人事处长（忘其姓名）随即出差到东京，以较高的待遇聘请日本电影界一流专家来满映工作，借以打破落后的局面，争取与上海影片相抗衡。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八木保太郎（战后一直担任日本小型电影制片厂理事长，写作、拍制了著名影片《原子弹下的孤儿》），就是这次率领一批专家应聘而来的，他被聘为制片部第一部长，从根岸一派的牧野部长手里取得了拍片的主要大权。

为了彻底摧毁根岸一派的群众基础，甘粕对一般日本职员则进一步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打击手段。在上层人事更迭告一段落后，甘粕又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召开全厂职员大会。在会上他忽然宣布，为了整顿人事，厂里已经按照职员所填写的履历表，和有关学校、单位进行了“照会”。发现许多人所报经历与事实不符，有夸大、虚报等问题。例如未上过大学而写上大学毕业，未当过股长而写上股长之类。行为恶劣，本应给予免职或降职

处分，但“心平气和地想一想，这类骗人的勾当之所以通行无阻，责任不完全在于个人，原来的管理工作的混乱是造成此种恶果的主要原因。为此，厂方决定，凡是扯谎骗人的，一律在本周内向人事课呈交始末书（检讨书），不得有误。”笔者当时在场，看到许多日本职员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，或脸上黯然无光，或低下头去。宪兵大尉甘粕的整人招法，委实高人一筹。

三

但是，以根岸理事为首的原有的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，对甘粕的下马威并没有心悦诚服。虽然他们多数都是日本电影界的三四流人物，是抱着到殖民地“淘金”的目的来到满映的，但盘根错节，势力雄厚。而且在他们眼里，甘粕虽是大和魂的化身，但对电影毕竟是外行，所以他们对甘粕的命令，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，甚至故设障碍，使之难以实现。因此，甘粕的改革计划，始终未能顺利进行，厂里的工作也未出现显著的起色。

有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。

（一）大约是1942年春天，满映举办运动会，参加者超过千人，盛况盛大，甘粕不仅致开幕词，而且参加了四百米接力竞赛。记得他在场上表现出奇特的形象：头扎白布条，手持接力棒。瘸着一条腿，一拐一拐地往前跑，速度和快走差不多，就这样坚持到最后。一般日本职员对甘粕跋足上阵的武士精神表示赞叹，但很少有人了解跋足的内情。记得在场参观的八木保太郎曾经小声回答一个同事的疑问说：“理事长命令总务课修理厕所的小便池，但未能及时做到。理事长一气之下，用脚踢小便池，挫了脚，所以这样。”可见，甘粕对行政管理混乱现象的整顿，并未能一气呵成。

(二) 大约1942年夏天，甘柏在中银俱乐部（今新华宾馆）召开关于影片拍制和剧本创作问题的座谈会。一则企图通过集思广益来寻求提高影片质量的门径，以摆脱落后状态；二则借机宴请导演、编剧人员，以鼓励士气。全厂业务骨干都被邀请参加，超过百人，场面很大。席间，甘柏要求大家献计献策，探索病因，打开局面。根岸则哭丧着脸，一言不发。大家一边喝酒，一边议论，七言八语，并无系统的意见。突然间，从主持人的座席上发出了震耳的吼声。对于满映影片没人看的问题谁负责这一点上，根岸首先大叫：“我的责任！”甘柏接着也大喊：“不，是我的责任！”当时全场的热烈气氛为之一变，大家都停止喝酒，默默注视。过了一小会，根岸又陡然大骂：“混蛋，混蛋！”他面向全场，不知骂谁。当时鸦雀无声，气氛紧张，足有几分钟之久。甘柏对此却毫无表情，只是默然不语。忽然有个名叫鸟居的剧作家站起来大声说：“满映没有人才？不，满映有人才！”他表现出一种愤愤不平的神气。接着在恢复宴饮之后，有的导演解释说：“根岸理事长不是骂哪个人，他是对外行人的干扰发泄烦闷的心情。”他的解释显然是有背景的，可能是真实地反映出甘柏与根岸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。

(三) 导演大谷俊夫原来是松竹电影公司的三流脚色，在国内吃不开，随老头子根岸来殖民地“捞金”，一举成为满映的红导演。他对甘柏非常不满，经常背后说他的坏话。1943年冬天，大谷携摄影师赴镜泊湖采外景，途经哈尔滨在旅馆吃饭时，他一边喝着日本清酒，一边向随行人员骂甘柏。他说他为表示敬意，曾从上海为甘柏捎来几瓶洋酒，但送到大和旅馆甘柏的住处时，甘柏却不让上楼，在电话里大叫：“我没时间！那些东西（指酒）算得了什么！放在柜台上！”连面也不肯见。大谷愤愤地说：“真不是一德一心！”他和随行的摄影师都认为甘柏蛮横

无理，不近人情。

(四) 1942年间，满映养成所(培训所)以较好的待遇招收了一批新生。可是入所后，待遇降低，招致学员不满。他们和人事课交涉，却无人理睬。莫可奈何之下，他们推选以李某为首的代表约五六人，集体去理事长室面见甘粕，交上了申诉书。甘粕看过，只问了一句：“是谁最先提出这个要求的？”但无人应答。甘粕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问这个也没意思！”然后，他便立即打电话给人事课，同时摆手叫学员代表退出。事后听说，人事课受到甘粕的申斥后，对学员代表的上告极为不满。

(五) 养成所所长后藤，也是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来的老人物，是根岸的得力骨干。他反对女学员佩戴黄金珠玉类的装饰品，认为这不符合“战时”的要求，同时发出命令，严禁使用。女学员不服，也到甘粕处告状。甘粕便召集全厂男女学员和男女演员开大会，听他训话。当时人们都以为宪兵大尉出身的甘粕，一定和后藤所长持同样观点。但事实却和人们的意料不同，甘粕竟而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后藤的命令打了折扣。他说，装饰品就是供人用的，当前不做新的就可以了，旧有的完全可以用。后藤才发出了禁用令，就碰了个开禁的钉子，弄得狼狈不堪。甘粕并添油加醋地说，为了提高培训的质量，今后打算从中国华北聘请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和教师，希望学员们安心受训。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就是对后藤的贬斥，这种借题发挥也表现出双方矛盾的深刻性。

以上所述，是笔者确知的几件事实。事情虽小，但足以反映出在根岸一派明里暗里的种种阻碍下，甘粕对满映的“大杀大砍”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八木保太郎一伙名人，是甘粕特地从东京聘请来的，是用来对付根岸一派的杀手锏，但来了之后并

未做出显著的成绩，却在1944年秋冬之际，突然不辞而别，全体返回东京。原因何在，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那就是：他们这些带有资产阶级自由色彩的艺术家们，一定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和甘粕的“军刀”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也反映出甘粕对满映改革的失败。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，甘粕正彦服毒自杀。

(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26辑。)

石井四郎秘闻三则

吕兵

石井四郎(1892—1959年)，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犯。1892年6月25日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伏见街(现芝山街)。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。1924年4月再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、血清学、防疫学和病理学。1926年毕业，从军，曾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、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、日本侵华第一军军医部长等职。日本投降后，他逃回日本，将有关细菌战资料送予美国，受到美国庇护，未受法律制裁。至今，世人公认他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元凶，但有关他在中国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具体罪行尚未全部披露。为此，笔者依据档案史料，略举秘闻三则，聊以示众。

一 石井四郎与渡边博士

渡边博士原是日本神奈川县立卫生实验所所长。1939年至1940年间，他却成为石井细菌部队菌苗班班长，参与用活人试